



近代江南迎神赛会的商业化运作探究

魏文靜

[摘 要]商业化运作是近代江南迎神赛会组织与运作最突出的特点,具体表现在资金运作、项目策划和组织管理三个层面。在资金运作上,行业祀神厘捐的发展促进了资金运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调动了捐资者的投资热情。在项目策划上,“异神”表演的舞台化和工商会的引入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了节事经济效益。在组织管理上,晚清衙役、民国军警与行业组织密切配合,确保了赛会管理有条不紊。江南迎神赛会的商业化运作以营利为目的,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为主体,以民间资本运作为主的运营模式,促成了迎神赛会由单一民俗节庆向综合旅游节事的嬗变。

[关键词] 迎神赛会;庙会;博览会;旅游节事;行会;商业化运作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6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5SJB334)

[作者简介] 魏文静,历史学博士,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学院讲师(江苏南京210046)。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198(2015)05-0154-06

近百年前，民俗学研究的鼻祖之一顾颉刚先生在考察北平妙峰山庙会时，曾感叹说：“赛会是南方的好，因为他们文化发达，搬得出许多花样，而且会得斗心思，一个地方有了几个赛会，就要争奇赌胜，竭尽他们的浮华力量。”^[1]此处的赛会即指江南迎神赛会。迎神赛会作为江南庙会的主要类型，以“争奇赌胜”“竭尽浮华”为特征，往往具有“一境若狂”的轰动效益，一直以来即为江南经济富庶以致奢靡之风盛行的重要表征。学界关于明清江南赛会屡禁不止与崇奢风气间的关系研究业已硕果累累。^[2]然而，仅从崇奢、炫富的心理角度探讨江南赛会的兴盛原因，仍然略显单薄，尤其是在近代江南经济遭遇西方经济冲击和战争破坏的背景下，江南迎神赛会仍然以排场大、花费多、影响大而著称，其极盛一时的盛况与江南经济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江南的近代化又对迎神赛会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尝试从赛会组织和运作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迎神赛会资金筹措行业化与规范化

迎神赛会的组织与运作复杂又精细,资金筹集是组织策划的首要。赛会资金多由民间募资,或以里社为单位,或以家族为单位,或以行业为单位。延续至晚清,江南赛会资金来源行业化的趋势愈益明显,行业捐资成为赛会资金的主要来源。以晚清江浙沪地区影响最大的宁波“都神会”为例,该会

几十年间一直由糖行、米行、六陈行等六个行业持续捐资,其中又以糖行捐资数额最大,在物力艰难的年份,若“糖行力有不逮则赛会减色不少”^[3],若各业艰难生意冷淡,则“一切纱船、彩阁皆停止不赛”^[4]。行业的持续捐资既带动了晚清赛会的发展,也使赛会在资金筹集方面表现出浓郁的行业依赖特点,金陵灯会“花灯炫彩华丽”,灯彩扎花所需竹木全部来自木行捐助^[5];杭州“东岳诞会”所需数十万,“半由个人捐集,半由各号垫用”^[6]。

行业捐资庙会的经济动机多样,炫富只是其中之一。正如《京口赛会》等文献所言,举会初衷,“一则预复往昔之盛观,一则藉获商民之齐集,以有易无,市面必更热闹”^[7]。可见迎神赛会与经济间的联系已成为工商界的共识,炫富只是行业捐资的非理性动机,振兴市面、复苏经济、追逐利润才是行业持久捐资的根本所在。

行业从赛会中获取的经济收益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类。显性经济收益是指赛会期间酒楼、饭馆、茶社等通过对香客或游客的直接商品交易所获取的利润，即通常所说的庙市经济收益。^[8]

隐性经济收益是指行业借助赛会形成的行业知名度和影响力,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品牌效益。关注隐性经济收益的多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工商行业,如丝业、钱业、木业、糖业等,其所涉领域与迎神祭祀并无直接关联,从中获取的直接经济利益相当



有限。但捐资赛会让其展现了行业实力和影响力，赢得更多商贸洽谈的机会，进而获取隐性经济收益。在长期的捐资中逐渐形成了“各业以所执之业认一二事”的格局，金陵“东岳会”中“油漆铺认牌对，绸缎染坊认伞旗，丝行认香亭”，各业借此展示实力，如“衙牌牌式不一，皆紫檀嵌空，两面镶五色玻璃。伞数百柄，计一伞之值不下三四十金，内绣四大名山、长江全图等，其价又不止以十倍数”^[9]。丝织业与迎神赛会的关系最为密切，赛会所用联灯、彩旗、沙船、台阁、服饰无一不需丝绸装扮，所用丝绸均系“时式花样，色色鲜明，穷极其丽”，否则“衣服暗淡，步列错杂，游趣顿减，无甚可观。”^[10]金陵“东岳会”于乱后，“一片荒凉，仅余下瓦砾”，后因缎业复苏“彩灯鼓乐较地方官出巡，尤觉整齐严肃”^[11]。其他如金陵木业捐资“上元灯会”、金陵钱业捐资“东岳诞会”、吴江丝织业捐资“双杨会”等，大抵原因都是如此。“双杨会”举会期间，当地酒楼饭馆等的直接经济收益仅数万元，但“双杨会”后的丝织品交易量却高达几十万元，约占盛泽镇全年丝织品交易量的1/10。^[12]《镇江市志》亦载：“每年镇江‘都天会’后各批发行业生意兴隆，成交额达数百万两之多。”还有些商户另辟蹊径，通过捐资中小型赛会以获取知名度和影响力。时上海一家名为升和的绸庄，从1874至1883年间，一直为“城隍夫人诞会”提供彩绸，其“所扎彩绸不需伸假于人，皆由己出”^[13]，通过持续捐资，绸庄知名度不断扩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庄铺。

行业对赛会隐性经济利益的追逐正是晚清赛会不同于清前中期的重要特点，亦是晚清赛会商业化运作的重要表现。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丰厚经济利益的追逐使行业对赛会的捐资相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行业成员的捐资热情，不同于传统香资摊派等平均摊派方式而是综合考虑行业成员经济水平差异的祀神厘捐制逐渐在江南盛行开来。

行业厘捐是明中期以后在江南会馆、公所中广泛采用的一种资金筹措方式，主要用于行业公所等行业设施的修建和行业事务开展，行业厘捐与宗教民俗事务结合形成祀神厘捐，始于清康熙年间。康熙四十五年(1706)吴江盛泽镇修建三义殿，率先采用厘捐的形式，“此庙历世常新之着，实在此一厘。缘凡省商贾贸易于斯者，计银两之多寡，留储每两千分之一”^[14]。到乾隆年间，丝织业市镇濮院也出现了厘捐，“乾隆二十八年(1763)里人创设一厘会，即机户卖绸一匹，绸行与接收合捐用钱一

文，勘着绸每匹合捐二文，有司事者共同经理，其所买绸数有炼坊簿籍可稽，万无遗漏。观工之外，凡遇寺庙工作，至今无不取给于是”^[15]。参照营业额多寡以千分之一抽取厘捐，充分考虑到各店经营状况的差异，形成了不同于香资摊派整齐划一的特点。“其所买绸数有炼坊簿籍可稽，万无遗漏”表明历历可查的账簿成为会资征收科学化的有力实证，确保了迎神赛会的资金稳定。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政府在江南地区广设厘捐局，向各行业征收厘捐以筹集军饷，官方厘金制度的产生加速了祀神厘金制的发展。自咸丰四年(1854)清政府在江苏首先确立厘金制度后，祀神厘捐逐渐从丝织业拓展到其他行业。这一年苏州府元和县的“韩王神诞会”由六陈米麦行中的粢祟客商和牙行共同捐输，“每石共捐制钱四文，以资备祭祀和神诞庆祝”^[16]。镇江“都天会”在咸丰十一年(1861)后实行厘金制，参加者须按营业额抽取一分左右的厘头，称“公厘”，作为活动经费。^[17]同治七年(1868)上海水木业“每工抽厘五文，如有自行备料，惟发点工者，每工抽厘二文”^[18]。光绪二年(1876)上海油麻业“统抽厘金、租、顶总计钱八百一十七万两千六百七十九文，其中常年敬神、金身复漆、醮资费共计三百三十八万六千四百文”^[19]。光绪八年“扬州都天神会，各行业提厘为出会经费”^[20]。光绪十六年后，上海旧花业“同业买货，价作洋数，每洋提钱四文，各照底簿，按月汇交司年收存，以备敬神等用”^[21]。从时间上来看，1861年后祀神厘捐制的全面推广从制度层面有效保证了晚清迎神赛会的资金来源。从地域上来看，祀神厘金在江南地区的推广程度较其他区域更深。而祀神厘金广泛流行于江南的原因，或许仍然与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从江南迎神赛会的资金运作来看，出于经济动机的资金筹措和运用经济手段的资金管理都表现出晚清赛会不同于清前中期赛会的商业化运作特点，迎神赛会的经济效益也更为明显。

二、迎神赛会项目设计舞台化与会展化

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是赛会久盛不衰的经济基础，追逐利润的经济动机更刺激了商家在赛会项目上谋划出新，主要表现为台阁人物世俗化、“昇神”表演舞台化和商品陈列会展化三个方面。

1. 台阁人物世俗化

台阁是将儿童或优伶分层固定在竖杆上，化妆打扮以扮演仙佛鬼神以及戏曲、传说、神话等故

事人物，再配以图案背景装饰，由数人抬扛，在街道或广场上巡游表演的形式。^[22]在南宋杭州“祠山诞会”时已有台阁陈设其间，但此时的台阁造型单一，且固定于露台之上，未与“昇神”巡游结合，规模与影响十分有限。^[23]台阁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始于明末，这一时期江南台阁逐渐形成了以丝绸缎匹和金玉珠宝装饰的表现传统，明人张岱回顾苏州枫桥杨神庙台阁时，就曾感叹“以锦绣饰之，使不见迹，上乘童子，装点故事。缀以金玉珠翠，必使绚烂夺目而后已”^[24]。

清朝覆灭后，模仿官员出巡的“昇神”仪式现实性减弱，政治传统断裂以致锣、旗、伞、扇等艺术表演形式的发展也相应受到限制。台阁则不同，自明末以来台阁主角则多为历史人物和戏剧人物，创作思路受政治影响较小，又因多以金、玉、丝绸装饰，艺术表现力强，艺术形式多样，因此晚清台阁的数量和规模都呈不断增长之势。镇江“都天会”有台阁一二十架，此“台阁一二十座非一人所能办，必前一年预为之，而出会前一日，尚不知今年之台阁是何戏剧也”^[25]，筹划周期之长，推陈出新之迫切可见一斑。

台阁推陈出新加速了台阁地方化和世俗化的趋势，源于草根社会的普通人物登上了台阁舞台。1888年宁波“都神会”时，“呆大成亲”台阁以呆大夫妇为主角引起一片骚动。^[26]民国初年苏州“城隍会”中十九座台阁分别取材于戏曲《老一百》《珍珠塔》《借茶》《打渔杀家》《白水滩》《十字坡》《水漫金山》《打店》等。剧中男主角多英勇威猛，女主角多美艳动人，《珍珠塔》中的陈翠娥、《借茶》中的阎婆惜、《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白水滩》中的许佩珠、《十字坡》中的孙二娘、《水漫金山》中的白素珍等，无不貌美如花。正因如此，台阁人物多由“娈童美少”装扮，不仅衣饰华美，表情更是顾盼生辉。1892年“都神会”台阁取自《双珠凤来富唱山歌》一折，其中花旦由名伶扮作，“清扬婉丽，艳若天人，使李三郎见之，当视梨园如粪土矣”，又有“两孩扮成吕布戏貂蝉故事，英雄儿女各有风情，颇足令见者魂消心醉”^[27]。民众对俊男美女的公开推崇，早已突破了礼教束缚，这种类似“屌丝”的行为既是商业社会中审美情趣外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商业社会中审美需求增长的重要例证。

2.“昇神”表演舞台化

从赛会的民俗特征来看，“昇神”仪式具有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唯一性，它在特定时间举行，于特定路线巡行，不可复制与再现。但商业利益却驱使

“昇神”仪式的时间与空间位移成为可能，发展为满足更多人审美需求的舞台表演项目。

晚清的上海，中西交融，新式园林、戏院和舞台不断涌现，为获取更多票房收益，赛会“昇神”表演也随之搬演至新式舞台。1892年，因“宁波神会之盛，四远驰名，近有人延之来沪，日迎赛于杨树浦半淞园。前日有友人之往观者”，归而述及：

会自园中望江厅起，旖旎绕长廊而出，先是园中添设各种名花，四处遍悬彩旗，五光十色，几令人目眩神迷，正中复搭成彩灯牌楼，高矗数十丈，其中暗藏綵绢扎成之八仙及双狮抢绣球，玲珑变幻，神秘无方。有白绸纱三角大旌一面，高约丈外，上书半淞园三字用六人擎之而走，继有彤云社五彩大方旗四面、行牌一面，继以红木雕嵌黄杨象牙之头牌，灯数盏，又有两人身穿白湖绸兜字接衫，足穿快靴，肩荷大金锣一对，沿途敲击，其声铿然。有年在十龄左右之二孩扮作中军模样跨白马执小方旗并辔而走，后为十景道遥伞、九联灯，再后为龙船……台阁。^[28]

1892年这次的“都神会”邀约，可视为赛会表演舞台化的肇始。半淞园地处上海南市，此处人烟稠密但缺乏相关娱乐场所，园主人吴氏此举开启了近代半淞园商业演出之先河，亦是近代赛会走向商业表演的里程碑事件。“都神会”表演从4月26日至5月27日延续一月有余，入园者华人每位收洋4角，西人每位收洋8角，小孩减半^[29]，商业售票使主办方获利颇丰。半淞园赛会后仅半月，上海和春茶社即邀请宁波“都神会”助阵新戏^[30]，赛会表演再次登上了商业汇演的舞台。之后“都神会”的办会方与和春茶园达成长期合作关系，“都神会”表演也成为了和春茶园的金字项目，知名度不断提升，以致慈禧60寿诞之时，商界巨擘四明公所亦专程邀请宁波“都神会”“来申以庆万寿”^[31]。

舞台化表演，将归属于不同时空坐标上的赛会项目汇聚于一处，使赛会在项目表演上博采众长，多元并存，为赛会由单一民俗节庆向综合旅游节事嬗变提供了可能。1911年宁湖义振游览会上宁波“都神会”与湖州灯景同台竞演，赛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奇观、异彩、新颖，拥有更多的游览元素。^[32]

3. 商品陈列会展化

庙市虽是赛会的基本功能，但在欧美会展风潮的影响下，庙市商品陈列也表现出浓郁的会展倾向。商业会展不同于传统的庙市交易，后者只是小规模的面对面以物易物，前者作为工业化的产物，



其展览内容多为现代工艺、地方物产，“一则为发展商务，谋求商业洽谈和订；二则使人感知物产之优劣、多寡；三则使人增长见识，开拓心胸”^[33]，其中发展商务的社会功能，正是中国传统赛会所缺失的。基于此，晚清的有识之士曾多次阐发革新赛会的主张，陈次亮倡议“中外之金石、古玩、名画、法书以及山海之珍奇、工作之器物，均可入会。购者议价，观者取资。立会之费，预筹专款。会散后储为博物院，备后人考镜之资”^[34]，先会后展，以会“拓利源”，以展“开风气”，将商战与教育并举。

1924年的盛泽“双杨会”可视为上述主张付诸实践的有益尝试。盛泽地处苏州吴江，明清以来即为著名的丝织业市镇，经济发达，文化昌明。但上世纪20年代，由于我国丝织业遭遇欧美、日本挑战，盛泽的丝织业也久久不能从低迷萎缩的颓势中自救。为发展商务，盛泽镇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西化赛会的想法。1923年徐蔚南在文中说：“赛会，各国皆有。若美国之华盛顿纪念会，南洋菲律宾之嘉年华会，尤为世人所称道。吾镇赛会，曷取法于彼乎？”^[35]作为地方报纸《新盛泽》的主编，徐蔚南的言论在当地自然具有舆论导向的作用。

“双杨会”又称“桑秧会”，起于清初，每十年举会一次，以震泽镇郊的双杨村为起点，途经震泽、梅堰、盛泽等市镇，前后延续半月有余，一直是吴江地区最盛大的赛会之一。举会之时穷工极巧为它处所不及，“苏杭各处放棹往观者数以千计”^[36]。但1924年的这次“双杨会”显然不同于以往，在赛会举行之前，地方实业家周心梅就提出“拟趁双杨会之机，举办蚕丝成绩展览会”的建议，商认为此举确有创新之处，不仅能展示蚕丝业发展成绩，而且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于是挪借绸业公所用于蚕丝技术展览。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次“双杨会”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双重特色，既有裹着丝织礼服的菩萨在会中“抬来抬去，相互迎送，相互致辞”，又有展示现代机械技术的工艺展品如装着活动机关的木偶“摇经，掉丝捕鱼，汽车等，颇有益于社会。”从“双杨会”的整体收益来看，筹办和举行期间，商品销售总额达到一百万之多，其中又以绸行为最，以“盛泽每年六七百万两的丝绸交易额计”^[37]，“双杨会”带来的收益至少占全年收益的十分之一，由此显示出传统赛会完全具有向现代会展转型的可能。之后不久南京“都天会”也采用了蚕丝成绩展览会的办会形式^[38]，可见盛泽“双杨会”的模式值得推广。

商业会展作为旅游节事的重要内容，其发展既

丰富了赛会的节事项目，也彰显了赛会的节事效应。从“双杨会”的组织筹划来看，这是一次传统赛会向现代会展转型的有益尝试，会展之商战、娱乐、教育三个功能在“双杨会”中均有体现。从“双杨会”的运作实况来看，具体组织和筹划者——商会是推进赛会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关键。因赛会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与商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休戚相关，因而“清末民初的赛会热，使振兴工商业的经济新观念获得长足发展”^[39]，赛会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同时，此种发端于民间的商业化改造，也与民国政府倡导的礼俗改造相呼应。1928年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曾发文各地，认为迎神赛会等迷信活动“因袭神权时代之思想，当此科学昌明之际，若任其存留，则所谓解除民众痛苦者，岂非徒托空言”，应“亟待根除”^[40]。尽管这种绝对的禁绝有时难免“矫枉过正”，但正是这种迫切追求现代化的意愿，不断激励着迎神赛会的商业化演进，也推进了赛会的组织运作更加科学有序。

三、迎神赛会组织管理科学化与有序化

迎神赛会常有“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轰动效应，数万人于短时间内汇聚一地，由此而来的管理压力可想而知。商业利益驱使晚清赛会举会愈频、规模愈大，管控压力亦随之增长。面对妇女孩童走失、桥梁房屋坍塌、群体械斗滋事等突发状况，为克服安全隐患和保证赛会有序进行，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在江南应运而生。

1. 政府主导赛会安全管控

晚清政府中主导赛会安全管控主要是衙门胥吏。清代衙门胥吏分为书吏和衙役两类，前者负责刑名、钱粮，后者主管地方治安。纵观“东岳会”“城隍会”“都天会”“都神会”等大型赛会多由胥吏主导管控。以宁波“都神会”为例，其管理层分为“柱首”和“总柱”两级：先由各行商家集结成社，每社推“柱首”一名，继而由“柱首”推举总柱，负责整项赛会筹划。但多年来“都神会”“总柱”一直由衙役担任，且一旦任职，便终其一生。^[41]

此种独特的管控体制亦是由胥吏特殊的政治身份决定的。胥吏是明清政治体系中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身处官民之间，比之于官，它仅为吏，具有更多民间性，比之于民，它作为吏，又具有更多官方性。^[42]以胥吏为“总柱”，既能有效调度力役人员以保障赛会安全，又可借助官民之间的特殊身份化解赛会中潜在的矛盾冲突，以维护社会稳定。然

而,由于胥吏籍贯多在本土,与各类地方势力纠葛不清,很难在矛盾协调中完全客观公正,如1888年宁波“都神会”时脚夫群体滋事,起因正是胥吏自身。^[43]

随着晚清赛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赛会安全管理的职责越来越重,为确保地方赛会安全开展,地方胥吏、警察开始调配到管理前线。1886年上海“雷祖诞会”,苏松太道恐“奸徒混迹,易肇事端”,遂饬各局员派勇梭巡,“上海县莫邑尊亦派差协同”^[44]。1919年,上海吴家厅赛会肇祸后,不仅有片警负责管控,更设置了专门的游巡支队负责赛会安全管理。^[45]在赛会的安全管理中,警察比之胥吏管控能力更强,管理手段更现代,管理效果更佳。然而由于近代军、警不分,军队的贸然行动却容易给民众带来恐慌与不安。^[46]

2. 行业公所主持赛会组织筹划

在长期的组织与策划过程中,政府与行业逐渐达成了互利合作关系。前者负责治安维护,后者筹划具体事务,各有分工。淮安“都天会”时,各会馆、公所事先确定人员分工,组织有关人员负责“接驾”“朝庙”等事项,协调出会顺序,布置出会现场,安排出会途中的祭坛摆设、道路整修和宣传发动等一系列工作。

除延续传统的筹划安排外,会馆公所还尝试将现代技术和传播手段用于赛会关键节点管理中。

(1) 夜会管理

夜会的管理难度向来较大,以致官府出言示禁“白昼尚可,禁止夜会”^[47],但随着现代化照明设备安装采用,夜间庙会的火灾隐患大大降低。1924年吴江盛泽镇宁绍会馆的小满“蚕神诞”会为实现演戏酬神的轰动效应,打破了禁夜戏的禁令,通过主办方——丝行与地方警察的合作,在会场安装临时电灯,有效保证了赛会的安全。^[48]

(2) 人群疏导

人群疏导是赛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会馆公所借助纸质媒体《申报》的影响,提前开展庙会“异神”范围和“异神”路径的宣传,防止拥堵事件发生。“城隍诞会”是晚清上海规模最大的赛会,每年于清明、中元、下元举行。1919年下元会在11月22日的《申报》上提前公布出会路线,此后相沿成例。

出庙朝东,往南过长生桥,止四牌楼,往西县东县西,往北三牌楼,往西画锦坊,往北过陈市安桥,往西过广福寺,朝西走梨园路,往北走万竹路,往西大境路,出拱宸路,朝南往老西门,一直出大东门,

往北走卤瓜街,往东走集水街,朝南走老马路,一直往东出大码头,往南过工巡捐局,往西进新码头,往北走老马路,往西进老白渡,往南过龙德桥,走芸市街,过花衣街,往西出王家嘴,往南过外仓桥,走南仓街,往西走教场街,往北出佛阁,往西过吊桥,往北过救火联合会,往西进东乔家路,朝北过塔水桥,往西进西塘家弄,往南转西走蓬莱路,过新县署,进安澜路,一直往南走过黄家阙路,一直过利涉桥,一直过审检厅,往西。^[49]

城隍出巡之前,组织者将出会线路公布于众,标明出巡时所过街道、桥梁、牌楼、街坊以及寺院等,有效引导人群结集和疏散,防止因人流过大而发生拥堵、踩踏等。^[50]

除内部交通疏导外,外部可进入交通也因技术成熟而得以改善。沪宁、沪杭铁路贯通从技术层面提高了交通的安全性与可进入性。1921年,上海龙华香汛期间,沪杭铁路线上“自三月初一至四月十五期间,每日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增开专车两次,藉以便利香客”^[51]。1926年宁波江湾赛会时铁路局除寻常列车外,特开专车11次。^[52]铁路的贯通逐渐改变了以香船为主要工具的交通格局,有效减缓了游客“水陆上下,踏木而行,履蹈甚险”的安全隐患。^[53]

迎神赛会组织和管理的科学化不仅保障了赛会有序进行,而且提升了赛会作为综合旅游节事的游客承载能力。1923年镇江“都天会”时,南京数千人乘沪宁早班车前往观瞻;^[54]1926年宁波江湾赛会时,仅火车运送的游客即达1万余人。迎神赛会的影响范围早已突破了“庙界”的限制,表现出更强的接纳性与包容性。

四、余论

迎神赛会源于“社祭”,其组织又称“社”、“里社”、“村社”。伴随着明清商业的发展,江南城市和市镇迎神赛会的组织基础逐渐由地域型“里社”向行业型“会社”转变,并在晚清社会急剧商业化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以“里社”为主向以行业“会社”为主的转型。行业组织的广泛参与使江南迎神赛会在资金运作、项目策划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表现出商业化运作特征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特性。可以说,迎神赛会已初步实现由单一民俗节庆向综合节事活动的嬗变。

迎神赛会的兴衰变迁与地方经济休戚相关。自明代以降600余年间,江南迎神赛会先后经历了明初、明末清初、清咸丰同治时期以及民国中后期



四个衰落期。此四个时期均为江南经济经历战争破坏后的衰退期,迎神赛会兴衰与江南经济状况间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5]。也正因如此,在江南经济遭遇1930年代经济危机以及日本侵华战争摧残而走向凋蔽的背景之下,在科学主义和礼俗改造批判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迎神赛会因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动摇也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清末民初迎神赛会在运作过程中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为主体,以民间资本运作为主的商业模式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顾颉刚:《妙峰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 [2] 钟晓鸿:《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0期。
- [3] 《胜会减色》,《申报》1888年5月21日,第2版。
- [4] 《赛会减色》,《申报》1878年11月1日,第2版。
- [5] 《雨阻赛会》,《申报》1877年12月17日,第2版。
- [6] 《重行朝审》,《申报》1881年9月2日,第2版。
- [7] 《京口赛会》,《申报》1879年6月6日,第2版。
- [8] 朱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 [9] 《东岳盛会》,《申报》1887年5月9日,第2版。
- [10] 《慈城赛会》,《申报》1884年5月24日,第2版。
- [11] 《东岳盛会》,《申报》1886年4月22日,第2版。
- [12] [37] 徐因时:《盛泽社会之一斑》,《新黎里》1923年6月1日,第2版,苏州吴江市档案馆藏。
- [13] 《邑庙观灯》,《申报》1874年3月29日,第2版;《庆贺神诞》,《申报》1877年5月11日,第2版;《邑庙悬灯》,《申报》1883年5月4日,第2版。
- [14] 《备修三义殿一厘缘碑记》,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440页。
- [15] 金淮:(嘉庆)《濮川所闻记》卷2《寺观》,《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32页。
- [16] 《元和县示禁保护韩蕲王庙祀碑》,王国平、唐力行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2页。
- [17] 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 [18] [19] [21] 《上海县为水木业重整旧规各匠按工抽厘谕事碑》《油麻业经抽售客厘金汇清总数碑》《上海县为旧花业公议章程谕示碑》,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0,350,362页。
- [20] 《都天胜会》,《申报》1882年6月8日,第2版。
- [22] 车文明:《台阁:一种古老而广泛的广场表演艺术》,《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 [23] 吴自牧:《梦粱录》卷2《祠山诞会》,知不足斋本,第15页。
- [24] 曹相骏:(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140-144页。
- [25] 欧阳兆熊:《水窗春呓》卷下《都天会》,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5页。
- [26] [43] 《赛会闹事》,《申报》1888年5月29日,第2版。
- [27] 《赛会志盛》,《申报》1892年5月30日,第3版。
- [28] [29] 《半淞园赛会即大花园》,《申报》1892年5月27日,第6版。
- [30] 《和春茶园准演灯彩新戏》,《申报》1892年6月22日,第5版。
- [31] 《四明长生会启》,《申报》1894年10月31日,第4版。
- [32] 《宁湖义振游览会特增赛会广告》,《申报》1911年9月26日,第3版。
- [33] 《论中西赛会名同而实异》,《申报》1886年5月9日,第1版。
- [34] 陈次亮:《赛会》,求是斋编:《皇朝经世文编五辑》卷3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476页。
- [35] 遂:《赛会小言》,《新盛泽》1923年9月1日,第2版。
- [36] 《桑秧赛会》,《申报》1881年4月29日,第2版。
- [38] 《地方通信》,《申报》1926年5月24日,第10版。
- [39] 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评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 [40]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抄转浙江省富阳县党部呈请取缔寺庙迷信活动函》(1928年8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8页。
- [41] 《胜会停赛》,《申报》1889年4月17日,第2版。
- [42] 赵世瑜:《两种不同的政治心态与明清胥吏的社会地位》,《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1期。
- [44] 《沪城杂记》,《申报》1886年7月25日,第2版。
- [45] 《浦东吴家厅出会照祸》,《申报》1919年4月14日,第3版。
- [46] 陈金镛:《余之生活观》,上海:上海广学会,1926年,第25页。
- [47] 《禁止夜会示》,《申报》1886年4月27日,第3版。
- [48] 《宁绍会馆演剧续志》,《新盛泽》1924年6月11日,第3版,苏州吴江市档案馆藏。
- [49] 《下元节赛会之路由》,《申报》1919年11月22日,第3版。
- [50] 《下元节赛会之路由》,《申报》1919年11月22日,第3版;《清明节迎神赛会之种种》,《申报》1920年4月5日,第3版;《城隍神会路由》,《申报》1920年11月10日,第3版。
- [51] 《便利龙华香客》,《申报》1921年4月7日,第3版。
- [52] 《江湾观会记》,《申报》1926年5月13日,第17版。
- [53] 《吴门赛会》,《申报》1882年6月15日,第2版。
- [54] 《南京快信》,《申报》1923年5月30日,第11版。
- [55] 樊树志:《盛世的投影——民间信仰与迎神赛会的记忆》,《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2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7页。

〔责任编辑:陈志刚〕